



贝德士文献研究

章开沅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章开沅 著

贝德士文献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经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宇宙光出版社)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16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德士文献研究 / 章开沅 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495-0349-0

I. ①贝… II. ①章… III. ①基督教-文献-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4642 号

出品人: 郑纳新

策划: 郑纳新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5 25 字数: 102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自序

正如多年以前香港《星岛日报》一位年轻记者所言：章开沅一生充满偶然。

青年时期爱好文学，很想成为一个持枪跃马的战地记者，却不料革命给我安排了终身职业——历史教师。

20 世纪 50 年代初，原本热衷于研究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及其具体实施状况，却不料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不远万里前来专心致志访求武昌起义资料，从此使我的研究兴趣转移到辛亥革命。

尽管 60 年代和 70 年代历经坎坷，但对辛亥史事的研究却痴迷如旧，80 年代以后在这个领域略有建树，海内外学界人士亦多以辛亥革命专家相期许，自己也很想终生潜心于此项研究。

不料（又是一个不料）1986 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刘子健教授与宗教系威尔逊教授联袂来访，并且建议我从事并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由于此前毫无思想准备，加以过去又缺乏研究基础，所以不能不问为

何有此建议。相知已深的子健兄笑曰：“一是因为你曾在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求学，二是因为你现在工作的学校前身华中大学也属教会背景，三是因为你既是历史学家而现在又担任大学校长。”他边说边伸出三个指头，然后以近乎最后决断的口气说：“我们认为你是最适合的人选。”

我是个可塑性很强并且随遇而安的人。他这番话立刻使我信服，于是，在耳顺之年又一次转移自己的研究重点。不过由于当时我还在校长任内，行政工作内外交迫，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所以在 80 年代最后几年只能做一些有关加强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倡议、联络与推动之类的零碎工作。1989 年 6 月初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和稍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可以勉强看作这几年断断续续工作的一点成绩。

真正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是 90 年代的事情。1990 年暑假，终于摆脱繁重的行政工作，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UCSD）三所大学潜心从事基督教与教会大学史研究。但出于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旅美三年期间主要是搜集教会大学史资料并阅读相关重要学术著作，亦即为此后的研究打好基础。撰写的论文很少，只有《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教会大学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政治》两篇。前者曾先后于 1991 年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与 1993 年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例会上报告，并且被收入《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台北，1995 年）；后者则是为 1991 年春在弗吉尼亚大学举办的汉学会议提交的论文。

1994 年 4 月，终于结束了前后将近四年的浪迹海外各地的流

动生活,回到华师重新开始潜心于自己热爱的学术工作,其中投入精力较多的仍然是教会大学史研究。因此,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多数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作品。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一文,试图对近百年来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作一番客观的宏观历史考察,不仅探索其宗教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此消彼长的轨迹,而且阐明其逐步走向专业化、世俗化、本土化的总趋势。此文把教会大学定位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并且努力从中国社会变化与政治变幻的总体上寻求其盛衰消息。教会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曾经顺应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潮流,多方面调适自己以求应对民族主义的挑战,企望在满足本土社会福祉的服务事工中扩大基督福音的影响,并且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赢得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但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中国国内与国际政治局势巨大、深刻而又急剧的变化,从此结束了自己的悲剧命运。中国教会大学的消亡,有外在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同时也有自己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其中包含着许多我们至今仍应认真对待的经验教训。

《“南京帮”的故事》则是对教会大学史的个案研究,考察的对象限定于以曾在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者为主干的一个小小传教士群体。“南京帮”是他们略带嘲嘘而又情有独钟的自称,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团体组织,但“南京情结”(实质上就是中国情结)却成为把他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心理纽带。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两个面向,既把以基督教为底色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又把以儒学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带回故土,而归根结底就是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来华的初衷当然

是谋求实现中国的基督化,但他们既然长期生活与工作在这个社会环境中,自身便无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逐渐“中国化”,其结果则是在中国与美国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边缘人”。讲述这个小小群体的故事,或许可以有助于增进对于教会大学史的理解,因为学校以教师为本,而他们正是这个“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极为活跃且影响甚大的一部分。

贝德士先后在牛津和耶鲁受过相当良好的史学训练,并且在金陵大学历史系任教近五十年。他的最后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继承和发展赖特烈的学术业绩,撰写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基督教通史。1965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退休以后,更以主要精力从事这一巨著的撰写工作。本书所收《东亚基督教的西方诠释——评贝德士〈差会与远东文化的关系〉》与《巨大的流产——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两篇文章,试图向读者概略介绍贝德士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宏观架构、基本理念与重要学术观点。《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1900—1950》这本大书的撰写,虽然由于作者的猝死而未能完稿,但其视野的广阔、思路的严密与对历史过程审视的缜密,至今仍使我们为之倾服。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尤其是基督徒)的尊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倨傲的批评,都显示出一位真诚的史学家与纯正的基督徒的精神风貌。贝德士为撰写这部巨著辛勤劳作历经13个寒暑,他所遗留的卷帙浩繁的相关文稿是一笔极为宝贵的遗产。我希望通过自己粗浅的评介,能对有志于利用这些资料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年轻学者有所裨益。

20世纪20年代,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教会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一文,确认民族主义浪潮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并且试图把教会大学

的发展变化放在历史主流中加以考察剖析。尽管从1922年4月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引发了轩然大波,并且与其后的五卅运动与北伐战争汇合为汹涌澎湃的反帝潮流,终于使教会大学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并承受猛烈冲击,然而此次反基督教运动终究没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再版。历史始终循着良性的导向前进,教会大学在中国不仅没有遭受致命挫折,反而逐渐呈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态势。本文不仅从非基督教运动方面着眼,而且也对过去往往忽视的非基督教另类声音给以考察,然后再从民间(主要是社会精英)、政府、教会三个侧面探讨多种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于这段史事重新认识,或许可以使我们比较清醒地理解现今社会、政府、教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南京沦陷期间,贝德士奉陈裕光校长之命以副校长名义留守金大校园,他不仅恪尽职责,奋不顾身地保护学校财产,并且参与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努力救援20余万难民,仅金大校园即曾收容逾万。他与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及相关中国职工一起,日日夜夜奋不顾身与野兽一般的侵华日军相周旋,并且如实地逐日逐人逐事记录下日军烧杀淫掳乃至贩卖毒品等各种滔天罪行。贝德士保存的国际委员会档案与自己的许多私人文献,都妥善保存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成为现今可供利用的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一项大宗重要资料。为了追念贝德士在南京沦陷时期的奋勇献身与感人事迹,同时也为了回击日本某些右翼势力对贝德士的诬蔑与攻讦,所以一并收入此文供读者参考。

2007年是马礼逊来华200周年,世界华福会学术与文化事工协调委员会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等团体,热情地邀请我提供一册有关华人宣教史的书稿,并慨允纳入“马礼逊入华宣教200年纪

念论文集”出版计划。作为多年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学者,自然应该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宏大的计划,所以自选并研究撰写了这六篇文章,聊以表达自己诚挚的心意。由于这些文章主要是研究贝德士并利用了他遗留的大量文献,所以把书名确定为《贝德士文献研究》,借以追念这位已故老师当年对我的教诲与关切。

目录

CONTENTS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
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 / 1

“南京帮”的故事：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 32

一、“南京帮”的由来 / 32

二、峥嵘岁月稠 / 36

三、患难见真情 / 44

四、永远的情结 / 51

东亚基督教的西方诠释：评贝德士《差会与远东文化的关系》 / 54

巨大的流产：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 82

一、准备工作 / 83

二、贝德士与赖特烈 / 85

三、提纲与试写稿 / 90

四、流产与遗产 / 108

教会大学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政治 / 112

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 127

一、一位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 / 128

二、揭露暴行乃是一种道德义务 / 132

三、首要工作是真诚地面对现实 / 145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 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

中国教会大学在大陆已经绝迹五十多年了,但它毕竟曾经存在半个世纪以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而且其影响至今仍然不难觉察,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①本文限于时间与篇幅,只想就贝德士博士(Dr. Bates)所遗留的相关文献,并且循着贝德士的视角和思路,从宏观上考察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我自己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起步。

① 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美国学者着手较早。从1954年开始,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主持编写出版一套有关教会大学的系列丛书,已出版的有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10种。70年代以后,又有一批学术专著出版,较重要者如 Jessie Lutz, *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 1850 - 1950*, Ithaca, 1971; William Fenn, *Christian Higher* (转下页)

—

首先,应该介绍贝德士博士其人。

贝德士本名 Miner Searle Bates, 1897 年 5 月 28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 Newark。父亲 Miner Lee Bates 是一名新教牧师, 长期担任海德姆学院(Hiram College)院长, 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小贝德士就在这所学院读书, 于 1916 年(19 岁)获学士学位。由于品学兼优, 得到罗兹(Rodes)奖学金, 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历史。时值欧洲战火正烈, 第二年(1917)他便离开牛津, 作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干事随军前往近东, 稍后又正式加入美国军队。

退伍后, 贝德士回牛津继续读书, 专攻近代史, 1920 年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这年夏天回到美国, 随即志愿接受教会派遣, 前往中国南京在金陵大学任教。这是他在中国教学生涯的开始, 直到 1950 年最终离华返美, 前后整整三十年; 金大以外, 他还曾先后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大学等学校兼课。同时, 他又在课余兼职于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Christian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太平洋关系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等机构。他经常为报刊撰写国际评论, 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

(接上页)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 - 1950*, Michigan, 1976; Philip West, *Yenche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 - 1952*, Cambridge, 1976;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1980。

20 年代迅速蔓延的反基督教运动,特别是 1927 年的“南京事件”,对金陵大学和贝德士本人都是一次猛烈冲击。金大副校长文怀恩(J. E. Williams)惨遭杀害,外籍教职员全部撤退。贝德士偕妻携子,先到上海,继往日本。事态平息以后,他是最先获准返校的美籍教师。此后一直在金大教书,直至抗战爆发。其间曾一度赴美深造,1935 年在耶鲁完成《公元前 221—前 88 年的中国历史》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1936 年至 1941 年之前,他曾七次访问日本,作为教会代表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其政府政策。当时,他是较早也较清醒地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必将点燃全面侵华战火警报的少数美国学者之一。

抗战爆发后,金大西迁成都。其时尚滞留于日本的贝德士,奉学校当局之命,历尽艰险穿过日军战线返回南京,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产。南京沦陷前后,他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的发起者之一,随后又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的骨干与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做了大量保护与救济中国难民的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贝德士又奉命交涉收回校产,为金大复校南京做了大量工作。1946 年 7 月 29 日,贝德士出席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目击者,他以无可辩驳的亲身见闻与实地调查资料,证实并指控日军大肆烧杀淫掳的万恶罪行。他的证词受到广泛传播和赞扬,他在南京沦陷期间援救难民的卓越贡献,亦曾经由国民政府授予襟绶景星勋章以示奖励。

1950 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和中美关系恶化,贝德士最终离

开金大返回美国。此后一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担任教会史等课程的教授,并经常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关学术活动。1965年退休以后,开始从事《基督徒在华奋进六十年 1890—1950》(*The Protestants' Endeavors in Chinese Society, 1890 - 1950*)这一巨著的写作。迄至1978年秋猝然病逝,他穷尽13个寒暑,为我们留下约1000种书刊、报纸的摘录和复印资料,还有3800页工作笔记(working drafts),其中包括全书预拟提纲,许多章、节的提要和初稿等。这批宝贵资料,连同他生前细心保存的信件、日记,其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手稿等各种文献,共130盒,1000余卷,全部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统称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贝德士文献是该馆“中国文献收藏”的一部分,编号为RG10^①,它不仅是贝德士一生的记录^②,也是中国教会大学的一部实录。可惜至今学者还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二

为什么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Non-Christian Country)会出现教会大学?什么是教会大学建立的主要宗旨?这个宗旨实现没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贝德士的手稿中寻求某些答案,虽然并

① “中国文献收藏”原文是China Records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包括许多在华美国传教士的私人档案,内容极为丰富。

② 以上贝德士简介,即据此文献所写,同时也参考了Maude Taylor Sarvis,“Bates of Nanking,”YMCA,1942,pp. 1-7。

不完整,也很难说是全面。

贝德士不仅是一个传教士教育家(missionary educator),而且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历史学者。他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去分析那些影响教会大学历史命运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因素。

贝德士陈述说,在1899年,在中国4.5亿总人口中,大约有2800个传教士导引着将近十万中国基督教徒。英、美传教士在一个贫穷的大国中工作,面临着排斥一切外来事物的强大挑战。传统的儒学教条和强烈的反帝情绪,成为基督教在华奋进的主要阻力。但是,需要西方先进科技而又缺乏现代教育制度,却为传教士们提供了新的机遇。外国教会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学校在各种境况下接触中国人并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在1890年至1907年期间,教会学校迅速增多,其中包括几所学院和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

贝德士认为,教会大学是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的产物。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1882年,只有1所教会学校可以界定为高等学校(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12年以后(1894年),增加到4所学院,不到300个学生。到1950年,增加到13所大学,13000个学生;这些教会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①

但是在基督教内部,对于教会大学却始终存在着意见分歧。贝德士指出:“教会中有些人强烈反对提升教会学校的层次,他们认为这将削弱‘直接福音’。宗教教育应是绝大多数教会学校的

① William B.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 - 1950*, Michigan, 1976, pp. 14-15.

重要功能,只有口头布道和宗教仪式才能福音化中国(evangelizing China)。但是罗伯特·斯皮尔,一位优秀的神学与福音传布者,他却深信教会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是一种优势(advantage),这可以通过介绍新知识、基督教理念、道德规范,使之植根于人心,从而减少社会猜疑并改善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特别是对于那些徒有其表的基督徒。”^①

上述两种意见的争论,长期持续于基要派(Fundamentalism)与现代派(Modernism)之间。从历史上看,现代主义最初是指天主教内的一种运动,它宣告基督教义应与时俱进,容许作必要的调节适应,并与阿夫烈·路易丝(Alfred Loisy, 1857—1940)及乔治·泰雷尔(George Tyrell, 1861—1909)的教旨结合。1907年教宗庇佑十世曾严加谴责。此后现代派则是专指新教(基督教)中新的神学趋向。一般称之为自由主义或自由神学(Liberalism or Liberal Theology);现代派与基要派经常发生冲突,因为一方代表自由主义的新教教义(Liberal Protestantism),另一方代表保守的福音主义(Conservative Evangelicalism)。现代派潜心于对《圣经》作批判地研究,愿意接受“现代科学”某些与《圣经》教旨差异甚大的结论,普遍拒绝上帝自我天启(self-revelation)的观念。

基要派,特别是建立于美国的基要派,在1920年左右专指保守的福音主义。在1910—1915年间,有一系列小册书籍取名《基要》(*Fundamentals*),用意即在反对现代派,坚持传统基督基本教义与价值标准,特别是要排拒理性主义与现代派的腐蚀影响,维护

① Miner Searle Bates, *Gleaning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 S. Bates* (edited by Cynthia Mclellan), New York, 1984, p. 43.